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

杨炯研究

陈于全 著



YZLI089017274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华中科技大学
文科学术丛书

杨炯研究



YZLI089017274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提 要

杨炯是初唐重要作家,历来对杨炯的研究比较少。本书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史学、文献学及其他相关知识,就杨炯及其文学创作做一些探索,主要内容涉及杨炯家族文化特征、杨炯人格特征、杨炯文学思想、杨炯文学创作、《杨盈川集》版本流传及相关史料研究等,力图较为全面地对杨炯其人及其文加以考察,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一些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炯研究/陈于全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609-7417-0

I. 杨… II. 陈… III. ①杨炯(650~?)—人物研究 ②杨炯(650~?)—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336 号

杨炯研究

陈于全 著

策划编辑:袁 冲

责任编辑:胡凤娇

责任校对:何 欢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5 插页:2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

刘献君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理工大学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进取精神,率先在全国理工科大学中开办文科,文科建设开始起步。1994 年初,以文学院(除经济学以外的所有文科)、经济学院(从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分离出来)的成立为标志,我校文科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经过文科师生的共同努力,文科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至 2007 年 8 月,我校文科已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学科、6 个博士后流动站、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3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73 个硕士点、26 个本科专业。

近 30 年的努力,我校文科建设取得了一些经验,其基本经验是:遵循“加强基础,面向社会,交叉见长,特色取胜”的发展方针,从高起点研究入手,尽快进入学科前沿,并依托学校工科、医科的强大优势,走学科交叉之路,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科。具体表现在: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全国首创了“网络新闻传播”专业,在新闻传播界树立了良好的文理交叉型教学与研究品牌;教育科学研究院强化研究特色,造就学科品牌,其“院校研究”异军突起,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哲学系打造学科亮点,依靠特色取胜,在社

会认识论、生存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生命伦理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济学院在张培刚和林少宫两位大师级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下,在发展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2006年获得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文系在科学研究方面体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其汉语言文学学科稳步发展,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科研课题 20 余项,其中包括 2004 年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信息处理和计算机辅助汉语史研究”;社会学系高度关注社会发展,其移民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在全国独树一帜;法学院则以科技法和经济法研究为突破口,立志创办全国一流的法学院;管理学院沿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调整学科结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连续 3 年的年科研经费超过 1 000 万元;公共管理学院依托学校理工科优势,把握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致力于信息技术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以“数字城市政府管理”作为自己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特色,取得了初步成效。

我校文科建设经过起步、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提高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

“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就是要在已经实现“重点突破”的基础上,努力克服学科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力加强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实现学科的均衡发展。

“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内外知名学者,产生出更多的大师级学者,大力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各个学科形成一个高水平的教授群体。

“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就是要继续大力开展学术研究,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基础学科的加强,是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要面向社会,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积极主动地去争取承担国家重大课题,从而通过我们的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的决策提供依据,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为创建和谐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推进文科建设,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5 年开始,我们出版了“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2000 年以后,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多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先后问世。“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的出版,在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推动学科建设、扩大我校文科学术影响、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学校已确定“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目标和“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的办学理念,因此,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文科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的文科教师要共同努力,产生更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提高文科学术研究的水平,进一步促进文科“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进程。

2007 年 10 月 10 日

目 录

引言 杨炯研究综述	(1)
一、杨炯世系及生平研究	(5)
二、杨炯文学研究	(8)
三、杨炯作品集整理	(12)
第一章 杨炯世系补考及其家族文化特征探究	(14)
一、杨炯世系补考	(15)
二、杨炯家族文化特征	(21)
三、杨德裔、杨炯妻族	(28)
第二章 杨炯人格:从沉静到酷烈、从敏锐到躁进	(33)
一、沉静而笃实	(34)
二、热情而敏锐	(39)
三、盲目而躁进	(45)
四、酷烈而轻薄	(48)
五、关于杨炯人格问题的几点补充	(53)
第三章 杨炯文学思想研究	(63)
一、初唐文学思想复杂状况	(63)
二、《王勃集序》文本解读及杨炯文学思想的意义	(72)
第四章 杨炯文学研究	(81)
第一节 杨炯律诗研究	(82)
一、杨炯律诗的对仗	(82)
二、杨炯律诗的声律	(88)
第二节 杨炯骈文研究	(106)
一、注重实用,体式众多	(106)

二、辞藻华美而丰厚	(110)
三、骈俪运用纯熟而巧妙	(113)
四、结构多端	(115)
五、气势雄厚	(118)
六、寡于情韵	(120)
第五章 《杨盈川集》版本源流考述	(125)
一、全集本《杨盈川集》	(125)
二、二卷本诗赋集《杨炯集》	(135)
三、一卷本诗赋集《杨炯集》	(142)
四、文集本《杨盈川集》	(145)
第六章 《杨盈川集》札记	(149)
一、萧彪考	(150)
二、隋唐之际“蒋国公”考	(157)
三、成休宁考	(160)
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陇西李氏“丹阳房”补考	(163)
五、《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蔡王房”补考	(167)
六、《公狄辩》考释——《全唐文》勘误一则	(176)
七、国图藏《初唐四子集》批语辑录	(181)
参考文献	(189)

引言 杨炯研究综述

杨炯(650—694?),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华阴)人,初唐四杰之一。曾举为神童,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十一岁,待制弘文馆,此后待制弘文馆长达十六年之久。上元二年(675)^①,应制举,补官校书郎。永隆二年(681),被薛元超推荐为太子詹事府司直、充崇文馆学士。垂拱元年(685),因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事件,被贬官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与宋之问分直洛阳宫中习艺馆学士。如意元年(692),任盈川县首任县令,吏治颇严酷,死于任所,后人称之为“杨盈川”。中宗复辟,以旧僚追赠为著作郎。

杨炯虽然政治地位不高,但在文坛颇有声誉。举神童,十一岁待制弘文馆,长期居住京洛地区,熟悉宫体文风;又领悟到上升时代的新气象,与卢照邻、王勃、骆宾王并称,被王勃视为知己;王勃诗文集成,为之作序;与崔融、宋之问交游,受到当时文坛盟主薛元超的举荐,与崔融一起为高宗武后祭祀中岳作祭文;求其创作碑文、墓志者络绎不绝,在崇文馆期间,许多文章出自其手。《旧唐书·杨炯传》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

^① 《文苑英华》卷一八作“上元二年”,张志烈、孟二冬皆从此说。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83页;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这三位都是当时文坛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推崇并非虚誉。而且杨炯学识渊博，其《浑天赋》，以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广为流传；其所作《公卿以下冕服议》，以朴雅渊深、富有见识平息了初唐很长一段时间的无谓论争；另有《家礼》十卷，已经散佚。宋之问《祭杨盈川文》对其才学推崇备至，虽多溢美，当亦有实据。不过其文章缺点，当时人们也已不以为然，如张鷟《朝野佥载》卷六：“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

杨炯为人在当时受到更多非议。其性格有褊狭躁进的一面，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记载了裴行俭评论四杰的一段很著名的评语：“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评曰：‘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余华而不实，鲜克令终。’”《新唐书·裴行俭传》载为：“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衒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嘿，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这段话在当时和后代被广泛引用。杨炯后来依附武后势力，晚年为盈川县令，《旧唐书》本传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为政酷烈，不守古道。

由初唐至盛唐，论杨炯及四杰者时有出现。郝云卿《骆宾王文集序》中云：“高宗朝，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杜甫之论更为精深，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本来就重视传承，遍取百家；其祖父杜审言更是四杰同时代之人，颇有与四杰同调之处。杜甫深谙诗歌变迁历史，因此，能够指出四杰在初唐诗歌变迁中的意义。此后大唐诗文迅猛发展，新的时代文学潮流淹没了也曾才华横溢的四杰，论者渐渐减少。

晚唐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

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代北偏师衔使节,关中裨将建行台。不妨常日饶轻薄,且喜临戎用草莱。郭令素心非黠武,韩公本意在和戎。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由于此诗风格戏谑,所以主要侧重论其不足,但是也包含了人们不满四杰的主要观点,那就是仍然拘泥于对形式的追求。

《新唐书·文艺传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绮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这里承续杜甫思想,认可四杰在历史转折中的作用。此后,这个观点被不断地继承阐发^①,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进一步归结:“诗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元杨士弘《唐音》:“自六朝来正声流靡,四君子一变而开唐音之端,卓然成家,观子美之诗可见矣。”

至于明代,随着诗论发展,在普遍认同杜甫论点的基础上,杨炯诗文艺术也被较为深入地探讨。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迹,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徐献忠《唐诗品·杨炯》:“杨生神明内颖,卓起少年,词华秀朗,凤耀四灵,与子安之徒并称杰子。芝含三秀,凤耀四灵,岂不蔚然观美哉!”张逊业《杨炯集序》:“炯之赋词义明畅,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浑天》考核更见沉深,推历氏今犹择焉。五言律工致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开元诸人去其纤丽,盖启之也。诸作差次之。五言古诗,唐人各自成家,备一代制可也。然以汉魏镜之,人人悬绝矣。”皇甫访《杨盈川集序》:“夫著作之文,张道济譬之悬河,

^① 李云逸:《卢照邻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其中附录三:“诸家评论”。

宋延清叹其游刃,若《浑天》之制,考核精详,《冕服》之辩,援引该洽,顾不可传耶?设使生同其时,则吴公之知贾傅,邛令知重长卿,抑奚让焉?”胡应麟论及四杰者较多,其中《诗薮·内编》卷四云:“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王子安虽不废藻饰,如璞含珠媚,自然发其彩光。盈川视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范阳较杨微丰,喜其领韵疏拔,时有一往任笔、不拘整对之意。义乌富有才情,兼深组织,正以太整且丰之故,得擅长什之誉,将无风骨有可窥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一二:“五言自汉魏流至陈隋,日益趋下,至武德贞观,尚沿其流,永徽以后,王杨卢骆,则承其流而进矣。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然析而论之,王与卢、骆绮靡者尚多。杨篇什虽寡,而绮靡者少,短篇则尽成律矣。炯曾云:‘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炯当时必多长篇大什,而零落至此,惜哉!”最为著名的是陆时雍《诗镜·总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不过,也有批评的,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一:“王杨卢骆,偶然同时有此称耳,非初唐至处也。王森秀,非三子可比。卢稍优于骆,杨寥寥数作,又不能佳,何其称焉?”

清代论者,与明代观点基本近似,对明代一些评价进行深化或批驳。王夫之《唐诗评选》评价杨炯《从军行》道:“裁乐府作律,以自意为止,混合入化。”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120”:“长律所尚,在气局严整、属对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开阖相生,不露铺叙、转折、过接之迹,使语排而忘其为排,斯能事矣。唐初应制,赠送诸篇,王、杨、卢、骆、陈、杜、沈、宋、燕、许、曲江,并皆佳妙。”施补华《岷佣说诗》:“王、杨、卢、骆四家体,词意婉丽、音节铿锵,然犹沿六朝遗派,苍深浑厚之气,固未有也。”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唐王、杨、卢、骆四杰,浑厚朴茂,犹是开国风气。自吾蜀陈子昂,始以大雅之音振起一代,泐泐乎清庙明堂之什矣。”刘熙载《艺概》卷二

《诗概》：“唐初四子，源出于山。观少陵《戏为六绝句》专论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四杰》：“杨盈川诗不能高，气殊苍厚。‘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是愤语，激而成壮。”“卢之音节颇类于杨，《长安古意》一篇，则杨所无。”宋育仁《三唐诗品》：“古章残佚，不见本原，唯《西陵》一首，苍健干立，有任范之体。律诗工对，其源盖出阴铿。才气无前，自谓‘耻居王后’。第藻浮于质，时有衰音。”丁仪《诗学渊源》卷八：“（炯）所为诗雄奇奔放，文质兼备，虽未逮卢之古雅、骆之蕴藉，以较子安，实为胜之，‘卢前’、‘王后’，宜彼不为屈也。”

明清诗论，对于杨炯诗文艺探讨不断精细，主要指出了杨炯诗歌律化较重、杨炯诗文格调雄厚、杨炯才学渊深等特征，也指出了其诗文未脱齐梁藻饰过重的缺陷。总的来说，由于杨炯诗文艺水平有限，再加上人格尤其政治品格问题，相对于在明清声名大盛的骆宾王，杨炯是四杰中最被冷落的一位。

在现当代繁荣的唐代文学研究中，杨炯及其文学的许多方面都或多或少地被涉及，比如杨炯世系及生平交游、杨炯作品集版本及校注情况，杨炯古诗、律诗、乐府、边塞诗、山水诗、赠别诗等诗歌研究，杨炯碑文、序文等骈文研究，都被关注过，也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相较四杰中的其他三位，杨炯研究依然比较薄弱，这里将杨炯研究现状略作综述。^①

一、杨炯世系及生平研究

（一）关于杨炯世系研究

台湾大学杨承祖《杨炯年谱》〔《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1973

① 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第三章第四节之五“杨炯研究”；姚敏杰：《初唐四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第六章“历代对‘初唐四杰’的评价”。

(13)]初步梳理了杨炯世系,但是较为粗略,没有辨析。在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附有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傅璇琮在其中进一步展开杨炯世系考述,梳理了杨炯世系基本面貌。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版)给出了杨炯世系清晰的表格。张晓蕾《杨炯家世探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3)]又补充了杨炯世系中“杨善会”的资料。

(二)关于杨炯生平及交游的研究

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原载《世界学生》二卷七期)曾指出王勃《秋日钱别序》中所谓“杨学士”即为杨炯,认为王勃、杨炯交游深厚,相互推许。这是关于杨炯交游的较早研究,可惜考之不详。此后,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成果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考证了杨炯神童科举当在显庆四年(659);应制举之科目当与崔融上元三年(676)之“辞殚文律科”相同;认为杨炯为詹事司直、充崇文馆学士;为盈川县令时间当在如意元年(692)之后;四杰次序主要因为王、杨时誉高于卢、骆,而所谓杨炯不满次序问题,并不与杨炯对王勃的推崇相矛盾。其中的一些看法颇为精准。杨承祖《杨炯年谱》简略地梳理了杨炯生平及作品。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卢照邻集·杨炯集》附《卢照邻杨炯简谱》中,全面地展开杨炯生平研究,涉及杨炯应制举时间、杨炯一些重要文章创作时间、杨炯为詹事司直时间、杨炯在蜀时间、杨炯在洛阳的交游、杨炯为盈川县令及卒年。这些研究虽然比较简略,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也不尽然准确,但这是第一次系统而深刻地研究杨炯生平。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杨炯》(中华书局,1987年版)基本观点不出《卢照邻集·杨炯集》所附《卢照邻杨炯简谱》。祝尚书《杨炯初入蜀年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04)]修订了杨炯为梓州参军时间。随后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考辨详尽,创获最多。骆祥发有《初唐四杰年谱摘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03)],在其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

1993年版)中列为附录,题为《初唐四杰年谱》,这份年谱比较简单。王兆鹏《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文学遗产》,1995(02)]认为杨炯可能卒于703年至704年之间,享年五十四岁左右。陶敏《杨炯卒年求是》[《文学遗产》,1995(06)]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傅璇琮、张志烈的认识是比较恰当的,即卒于693年或稍后。二人反复讨论,深化了关于杨炯卒年的认识。

(三)关于“盈川”、“华阴”及相关传说

钱学文、何承朴《初唐“四杰”与天府》[《四川大学学报》,1980(04)],认为“盈川”在四川。祝尚书《杨盈川之“盈川”辨》[《中华文史论丛》,1983(03)]指出“盈川”乃是浙江衢州之“盈川”,此后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也采用这种说法,遂成定论。蔡静波《杨炯卒所“盈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02)]、《杨炯生地华阴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03)]也补充不少史料。钱学文、何承朴《初唐“四杰”与天府》,赵仲才《促进唐诗繁荣的陕西才子杨炯》(《三秦文化研究会年录论文集》,2004年),汪浙成《衢江诗魂——寻访“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遗迹》[《文化交流》,2005(01)],周纪焕《杨炯曾任县令之“盈川”考辨》[《浙江社会科学》,2006(06)]、《杨炯“酷吏”辩诬》[《浙江学刊》,2007(05)],不仅考辨了杨炯生平的若干问题,还介绍了在四川及衢州等地流传的杨炯故事,丰富了杨炯研究。

(四)关于杨炯酷吏说不可信考辨

《旧唐书》、《新唐书》杨炯本传中,有关杨炯为政酷烈的说法,历来学者颇有争论。中华书局版《卢照邻集·杨炯集》附《卢照邻杨炯简谱》中,傅璇琮就对此说法颇不以为然,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也认为“杨炯为酷吏不可信”,一般论者都认为乃是杨炯恃才傲物而招致诬陷而已。周纪焕《杨炯“酷吏”辩诬》[《浙江学刊》,2007(05)]更列举后世材料积极辩诬,虽然说明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后世传说材料不能完全采信。

二、杨炯文学研究

现当代学术史关于杨炯文学研究主要涉及三点：一是杨炯诗歌体格问题；二是杨炯律诗；三是杨炯骈文。在此略述之。

（一）关于杨炯诗歌体格问题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杨炯诗虽说与王勃同调，但辞彩却要比他高出一些。”胡云翼《唐诗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炯为人颇恃才，诗亦有壮气。”胡小石《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1930年版）、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上海大江书铺，1933年版）指出四杰是初唐文学中齐梁格调的代表。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海大江书铺，1931年版）把初唐四杰划归为“继承齐梁的诗人”。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中正书局，1935年版）称四杰为“保守派”，并说：“此派王、杨、卢、骆四杰化五言诗成七言长篇最为有名。唯保齐梁风格，人多诟病。然其独到之处，杜甫能知之。”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1932年版）认为四杰的出现，在初唐文坛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唯意境较为阔大、深沉，格律且更为精工、严密耳。他们是上承梁、陈而下起沈、宋的”。这些论述，基本上都是对于明清论点的继承。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的论述则更为全面深刻，也广为学者引用：“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从年龄上说，卢、骆比王、杨平均大了十岁；从性格上说，卢、骆比较“浮躁”，而王、杨比较“沉静”；从友谊上说，卢、骆与王、杨也是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这是第一次涉及杨炯家世及性格与其他三位差异的论述，并进而指出其诗文格调的变化：“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强调初唐四杰对之前宫廷诗歌艺术

的继承和发展,五六十年代则着重论述初唐四杰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和革新。周祖谟《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认为:四杰作品“抑制了上官体诗的泛滥,把诗歌引向健康的方向”;杨炯“五言律诗大多是抒发作者自己政治上的雄心壮志的,而这些诗都是以边塞和战争生活为题材来反映的,因而气势较大,有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认为四杰担负起了时代的使命,“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究竟是从他们才开始形成”的。刘开扬《论初唐四杰及其诗》(《唐诗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认为“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上的较为接近人民,是应该得到重视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对四杰的研究全面展开的背景下,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03)〕指出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关系复杂。张明非《略论初唐“四杰”的山水诗》(《唐音论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同之前山水诗相比,四杰山水诗意境更为阔大、浑成。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则将四杰的山水诗放到“初唐山水诗的复变”过程中来考察,指出初唐四杰山水诗的继承与创新。杜晓勤《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文学评论》,1995(03)〕认为,初唐四杰独特的文化心态、艺术精神的形成受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别具文化内涵的儒学思想和以老庄人生哲学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的影响。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在阐述四杰文学创作时,剖析较为细腻。这些论述,突破了习惯上的体格研究,视野更为开阔。

(二)关于杨炯律诗问题

初唐四杰在律诗形成过程中作用重大,因此论者颇多。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认为:杨炯诗歌“若《从军行》、《出塞》之类,也都不在王勃之下”。胡云翼《唐诗研究》则说“就诗而论,杨炯或应列在四杰之末”。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认为四杰的五律,“都可奠定五律的基础”。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